

指定讨论发言稿

郑洁西

1, 渥美国际交流财团联系我, 希望我能谈谈我的老东家(原来所在单位)宁波大学在公众史学这方面的情况。

2, 我主要解读明代行政公文书, 主要基于文献材料开展历史研究, 对公众史学算是外行, 其实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既然有这方面的要求, 我就勉为其难地谈一点自己的粗浅见解。

3, 宁波大学的公共史学是由钱茂伟教授开创的。钱教授出身于中国史学史专业, 原本专攻明代史学史, 主要从事古籍整理、科举史、史学著作等相关领域的研究。钱教授在后来的教研工作中对公共史学产生了兴趣, 做了大量相关理论、实践研究, 在业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 是国内公众史学界的代表人物。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的研究者并不局限于历史学者, 大量研究生、本科生也被发动参与进来, “口述历史”则是学生们做得最多的一个领域。让所有人都成为历史主角, 让本科生也成为“太史公”是该校公众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4, 据我个人所知, “公众史学”有两个做得比较好的案例。一个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 一个是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半外交家中的“半个”外交家顾维钧的《顾维钧回忆录》。前者是溥仪在东北抚顺战乱管理所服役期间本人口述而成的一份自传体悔罪材料, 后由出版社派人协助完成并正式出版。顾维钧的回忆录则为接受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计划”的高水平之作, 除了顾维钧本人的口述, 还采用了大量日记、会谈记录、信函文件、电报档案编纂而成, 历时长达 17 年之久。两位主角都不是历史学者, 一位是“末代皇帝”, 一位是外交家, 是众多国内国际重大政治外交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人, 通过“口述历史”这一路径, 还原了其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人物、事件, 披露了不少鲜为外人所知的背景和内幕, 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要一手资料, 在学界影响力很大。但这两种“公众史学”并不局限于“口述”, 有着大量其他文献资料的佐证, 有着较高的严谨性。

5, 我没有参加宁波大学的“公众史学”研究项目, 但自己也确实参与过一些公众史学活动。每个人接触历史时, 多多少少会对自己家族的历史有兴趣。我就曾花了一些时间去挖掘、整理自己家族的历史。我们家原本耕读传家, 比较重视文字记录, 但在近代以来, 因为战争以及 1949 年以后的某些政治运动, 文化几乎断层(被抄家, 被剥夺受教育权), 已有文献的散佚情况也比较严重, 目前仅见我的曾祖父的祖父、伯父各留有一个诗集和文集, 我的曾祖父的一个诗文集, 都是因为偶然的因素才得以留存, 而除此之外, 文献方面仅有家谱里的世系或简传可供参考。但因为我的曾祖父活到 90 多岁, 村中镇上年长者中很多人都知道他的事迹, 我便通过采访这些人, 邀请“公众”参与“史学”得以抢救了他的一些历史经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和我的家族算是“公众史学”的受益者。但因为记忆存在时限问题, 再往上追溯则很难具备可能性。

6, 我接触“公众史学”过程中也看到几个问题: 第一, 可信度问题。众所周知, 史学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求真务实”, 传统史学对史家的素质有较高要求, 但“公众史学”的参与者, 既可以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者, 也可以是未曾有过任何历史学素养的外行人士, 这些参与者鱼龙混杂, 良莠难分, 他们所叙述“历史”的可信度,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素养, 有些受访者只想告诉别人他想告诉、能告诉人的一面, 但会刻意规避另外一些信息。此外, 很多口述者作为历史主角不一定具备学术良知或道德良知,

其对自己的叙述往往极尽虚夸之能，其所叙述的历史有时候会偏离正常轨道，很多涉及到利害关系的历史信息则往往会被巧妙地移植、嫁接甚至被黑白颠倒，文革时期的“英雄战士”刘世保案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在“公众史学”大行其道的当下，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仍然需要兼顾，历史学者应该尽可能地坚持历史的客观性原则。第二，伦理问题。我最近在做一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某山区小镇的两百余名赴日务工者群体的研究，这些人已经都不在世，目前最全的资料仅仅是 1984 年的一个全县华侨排查采访记录，我根据这份记录采访了很多当地人，发现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这批赴日务工者在上世纪 30 年代还带来多名日本女性回到山区。当地人认为她们是被“拐骗”过来的，有如近期徐州出现的拐卖妇女事件。通过跟踪调查，后来联系上了其中一位日本女性的孙女。这名孙女现居日本，告知本人其祖母来中国时 20 来岁，在浙江山区生活了 40 年，嫁过两个山民，大概在 1977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方才回日本，并把儿孙辈都接到日本去，在日本又生活了近 30 年，一直到十几年前近百岁时才过世。据该孙女回忆，其祖母头脑清晰，素养甚高，但对往事却绝口不提，其家人对她的早年经历几乎一无所知，1984 年的采访记录也没有关于她的任何信息。在这个个案中，能够参与的“公众”并不少，但所能得到的信息却相对匮乏。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名女性参与“公众历史”的意愿过低。虽然我们可以通过排查中日两国档案以及进一步采访相关涉事人尽可能地还原出这名日本女性的过往历史，但挖掘和公布这段历史可能会某种程度上对其本人及其家族造成伤害，关于这个个案，在事先需要就伦理问题有所斟酌。第三，研究价值问题。我在采访中遇到过某些群体，其学历较低，语言逻辑也差，生平事迹并不具备代表性，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能采访到的内容主要是其日常，就如“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山上有座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这样千篇一律的循环往复故事。这种记录非常真实，但意义不大，采访得再多，资料堆砌得再多，也缺乏历史价值。“公众史学”虽然扩大了历史研究对象群体，对“太史公”群体也降低了要求，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历史研究的价值方面有一个基本的追求，尽可能地创造具有代表性、独特性的高质量历史研究成果，尽量避免制造大量重复的、低层次的历史叙述垃圾。

7，最后讲一点现实问题。历史学作为传统学科，在中国被取消掉的概率不是很高，但因为这个专业相对冷门，目前的饱和度较高，就业前景并不理想。即使博士毕业生也很难在找到理想工作。有些大学或压缩历史学专业的招生名额，或在课程设置上缩短历史学基础理论的学习而造成历史学毕业生历史知识贫乏的怪现象。疫情爆发以后，历史专业就业率呈降低趋势，以研究生为例，今年毕业的我的研究生所在班级 22 名同学，除了两名考上博士，剩下有一半工作尚无着落。他们意向中的就业方向，除了进初高中做历史老师，就是考公务员或其他事业单位。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些单位在体制之内，是政府财政支持的，经济上有保障，而疫情背景下的其他工作则很难具备这种保障。整个社会的年轻人首选进体制，历史专业的本硕博学生概不能免，这或许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某个社会问题。